易長觀世音像考

李玉珉*

【摘要】目前美國維吉尼亞美術館、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以及日本大阪美術館各發現一尊觀音菩薩像，祂們皆左手扣執淨瓶，在祂們繁縟的瓔珞中，於腹前發現一個浮雕著涅槃圖的圓形飾版，在腿部又有一組坐佛三尊像。根據風格分析，筆者認為這三尊菩薩當分別為大理國前、中和後期的作品。本研究指出，這種圖像特殊的觀音當稱為「易長觀世音」，目前僅見於大理國的文物中。這種觀音的圖像與信仰自南詔第十一代主酋**隆由四川攜回雲南後，至十二世紀下半葉，在南詔、大理國**的流傳歷久不衰，尤值注意的是其特別受到皇室的重視。又因為這些易長觀世音像的寶冠或出現金剛界五方佛冠，或出現大日如來，反映南詔、大理國時期，雲南也曾有純密的流傳。

關鍵字：南詔　**大理國　雲南　觀音菩薩　易長觀世音　梵像卷　密教**

引言

2004年旅日台僑彭楷棟捐贈了一批亞洲金銅造像給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其中有一尊觀音菩薩立像（圖1A），瓔珞嚴身，裝飾華麗，鑄造極為精美。這尊觀音眉間有白毫，右手舉至胸前，食指翹起，左手手掌向下，手指扣執淨瓶瓶口，瓶中插一枝蓮花（蓮花部分殘損）。與一般觀音菩薩像不同的是，這尊觀音寶冠中出現的不是立化佛或阿彌陀佛，而是五方佛（圖1C、D、E）。此外，其腹前珠串交叉處有一圓形飾版（圖1F），浮雕著一尊右脇累足而臥的佛像，身後有兩列弟子，面露悲悽的表情，在臥佛身前的人物則為釋迦佛所收的最後一名弟子須跋陀羅，無疑是一幅涅槃圖；在小腿間，又浮雕一坐佛三尊像（圖1G），圖像特殊。可是無獨有偶地，在美國維吉尼亞美術館（The Virginia Museum of Fine Arts）和大阪市立美術館的收藏中也各發現一尊觀音菩薩立像（圖2A、3），無論在持物、手勢、冠飾等方面，祂們皆與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的觀音菩薩立像相彷彿，而且腹前也有圓形的涅槃圖飾版，小腿或近膝處也發現一組坐佛三尊像。這類觀音菩薩像的圖像特徵不見於佛教經典的記載，其尊號為何？值得探索。

＊國立故宮博物院書畫處　研究員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的觀音菩薩立像（以下簡稱台北觀音）高46.7公分，美國維吉尼亞美術館所藏的觀音菩薩像（以下簡稱維吉尼亞觀音）高45.8公分，大阪美術館所藏的觀音菩薩立像（以下簡稱大阪觀音）高45.6公分，三者的尺寸相近。由於上述這三尊觀音像都是傳世之作，出土地點不明，各家的斷代意見分歧。台北觀音的原收藏者彭楷棟先生認為此像是五代之作，①Hugo Munsterberg和維吉尼亞美術館指出該館所藏的觀音立像是十世紀的遼代作品，②而大阪市立美術館則主張該館所藏的觀音菩薩乃北宋（960-1127）初的造像。③從風格來看，台北觀音和維吉尼亞觀音的確十分近似，可是二者卻和大阪觀音像相去甚遠。這三尊觀音像是否真的都為十世紀的造像？則有待釐清。

此外，十世紀時，中國爭戰不斷，政治動盪，四分五裂。在唐朝滅亡（907）後的短短五十多年間，黃河與渭水的下游地區，先後有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和後周五個朝代的興廢。直到顯德二年（960），後周禁軍領袖趙匡胤代周執政，改國號為宋（960-1279），才結束了紛擾不休的五代。不過，當時在遼東至河套一帶，有契丹人建立的遼國（916-1125）壓境，雲南地區又有白族段氏建立的大理國（937-1254）割據一方。目前學界在南北朝和隋唐佛教造像風格的研究上，成果豐碩，然而迄今只有少數學者關心唐代以後的造像風格演變，④更遑論十至十三世紀中國佛教造像區域風格特色的探討。上述這三尊觀音菩薩像的風格差異，究竟是時代不同所致，還是區域有別所造成的？也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

---

①該像曾於1987年在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金銅佛造像特展」展出，該次展覽所有的展品資料皆由收藏者彭楷棟（日名新田棟一）提供。這尊觀音菩薩像的斷代資料見國立故宮博物院，《金銅佛造像特展圖錄》（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87），頁72、圖版玖拾。

②Hugo Munsterberg, *Chinese Buddhist Bronzes* (Tokyo: Charles E. Tuttle Company, 1967), p. 68; Julia K. Murray, "The Virginia Museum of Fine Arts-the Asian Art Collection," *Orientations*, vol.12, no.5 (May 1981), Fig. 21.

③大阪市立美術館，《大阪市立美術館藏品選集》（大阪：大阪市立美術館，1986），頁163。

④Alexander C. Soper, "Some Late Chinese Bronze Images (Eighth to Fourteenth Centuries) in the Avery Brundage Collection, M. H. de Young Museum, San Francisco," *Artibus Asiae*, 31: 1 (1969), pp. 32-54; Marilyn Leidig Gridley, *Chinese Buddhist Sculpture Under the Liao* (New Delhi: 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Indian Culture and Aditya Prakashan, 1993)；松原三郎，〈五代より宋代造像への進展〉，收入松原三郎，《中国仏教彫刻史論》（東京：吉川弘文館，1995），頁205-215。

臺灣大學藝術期刊資料庫

本文擬就上述這三尊觀音菩薩立像的鑄造年代、鑄造地區、尊號、源流以及這類觀音菩薩圖像的宗教文化意涵等方面，提出一些淺見，以就教於方家學者。

年代考訂

維吉尼亞觀音像（圖2A、2B）頸短臂粗，頭手的比例略大。面龐圓潤，頰頤飽滿，曲眉杏目，嘴角略含笑意。身穿右袒式僧祇支，於小腹上方束起。天衣與珠串自兩肩披掛而下，繞經兩肘，兩端垂掛至足側。下著長裙，腰繫金屬或皮革式的腰帶。腹前懸一布帛，長及於地，尾端平舖於兩足前方。頂束高髻，頭戴花蔓寶冠，在頭兩側的冠沿下方還以四個獸首為飾。冠繒和珠串自兩耳上方垂下，及於上臂。耳璫垂肩，戴臂釧和手環。胸前的瓔珞除了團花和串串珠飾外，胸口還有一個獸面，每一珠串的尾端尚飾一顆似寶石的綴飾。自兩肩垂落的珠串在腹部相交，延至下身。全身的瓔珞密匝布排，交織成網，真可謂極盡華麗之能事。Munsterberg氏言，維吉尼亞觀音的體積感顯著，保存較多唐代的遺風，故推測為十世紀之作。⑤此像豐腴的面龐的確保存了唐代的餘韻，高聳華麗的花蔓寶冠、頭大肩窄的身軀結構，又和四川大足北山佛灣第二五三龕中的觀音菩薩（圖4）有些類似。內著僧祇支、外披天衣的服裝樣式，以及腹前垂掛長及於地的衣帶等特徵，也與浙江煙霞洞窟口右側的觀音菩薩像（圖5）雷同。北山佛灣第二五三龕開鑿於前、後蜀時期（907-960），⑥煙霞洞的觀音菩薩像又為十世紀之作，⑦因此筆者同意Munsterberg氏的觀點，也認為維吉尼亞觀

⑤Hugo Munsterberg, *Chinese Buddhist Bronzes*, p. 68.

⑥參見重慶大足石刻藝術博物館、重慶出版社編，《大足石刻雕塑全集．北山石窟卷》，圖52。

⑦雖然煙霞洞的觀音菩薩像並無題記，可是在窟內岩壁的十六羅漢中，發現了一則「都指揮使、銀青光祿大夫……吳延爽捨三十千造此羅漢」的題記。吳延爽是吳越王錢弘俶的母舅，北宋建隆元年（960）因謀亂，被放逐外郡，所以這些羅漢造像的時間應該在建隆元年以前。而窟口的兩龕觀音像的刻鑿年代也應與之相去不遠，**當是五代至北宋初年**、十世紀的作品。參見丁明夷，〈南國有嘉像繽紛入世眼—南方八省石窟雕刻概述〉，收入中國石窟雕塑全集編輯委員會，《中國石窟雕塑全集10 南方八省》（重慶：重慶出版社，2000），頁16；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西湖石窟》〈序言〉（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頁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音像應作於十世紀。

台北觀音像與維吉尼亞觀音像，不只圖像類似，就是在五官面相、服裝樣式、瓔珞布排等方面，也都相彷彿。只不過台北觀音的臉龐和腰枝略長，身軀（圖1B）也不似維吉尼亞觀音那麼粗短壯碩（圖2B），大腿部分的瓔珞更為繁複。推測年代可能較維吉尼亞觀音稍晚，約為十世紀下半葉至十一世紀初的作品。

Munsterberg氏和維吉尼亞博物館都指出維吉尼亞觀音應是遼代的造像，可是細審遼代造像⑧（圖6），發現其面圓額窄，眼細眉平，鼻樑挺直，鼻尖略勾，嘴角下抑，神情端嚴，不苟言笑，其臉型、五官特徵和表情神韻均與上述兩尊觀音像迥然不同。此外，遼代的菩薩像身體比例亭勻，體態自然，身軀肌理的起伏處理細緻，衣褶自然流暢。然而台北與維吉尼亞的觀音像卻頭手稍大，姿勢端嚴，缺乏動感，身軀結構與衣紋都被華麗繁縟的瓔珞所掩，造像觀念顯然與遼代的菩薩像大異其趣。更重要的是，台北和維吉尼亞觀音菩薩像的服裝和瓔珞樣式，在遼代造像裡從未發現，因而筆者認為這兩尊觀音像當非遼代之作。那麼祂們是否可能為五代或北宋初年的作品呢？將這兩尊觀音和大足北山大佛灣前蜀永平五年（915）第五十三號龕的脇侍菩薩像（圖7）、煙霞洞的觀音菩薩（圖5），**以及日僧**奝然於雍熙二年（985）委請台州工匠模刻汴梁（今河南開封）釋迦瑞像而成的**栴檀釋迦立像**⑨（圖8），作一比較，發現維吉尼亞與故宮的觀音像無論在臉形與五官特徵和瓔珞樣式等方面，都與四川、江南和中原的佛教造像有別，顯示其是五代十國或北宋作品的可能性亦不高，因此推測這兩尊觀音菩薩像可能為大理國的造像。

根據雲南地方傳說和稗官野史，早在南詔（649-902）建國之初，阿嵯耶觀世音即化為梵僧，到雲南弘法。在南詔、大理國的文物裡，梵僧觀音像時有所見，⑩是中古時期雲南地區特有的觀音圖像。美國波士頓美術館收藏著一件南詔晚期的

⑧由於本人目前尚未發現遼代金銅的菩薩立像，故只得以遼代下華嚴寺泥塑的菩薩立像與維吉尼觀音進行風格比較。

⑨京都國立博物館，《釋迦信仰と清涼寺》（京都：京都國立博物館，1982），頁4-6。

⑩圖見李霖燦，《南詔大理國新資料的綜合研究》（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82），頁97；李昆聲主編，《南詔大理國雕刻繪畫藝術》（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雲南美術出版社，1999），圖107。

臺灣大學藝術期刊資料庫

梵僧觀音菩薩三尊像（圖9），兩側的脇侍觀音兩頰豐圓，頭大肩窄，身軀粗壯，兩足直立，姿勢僵直，祂們的頭身比例、身軀結構、姿勢等都與維吉尼亞和台北觀音有幾分相似。

此外，雲南大理白族自治州劍川縣境內的石鐘山石窟是南詔、大理國時期開鑿最重要的一個石窟群，⑪大理國時期雕鑿的第七窟主尊觀音菩薩（圖10）無論是橢圓形的開面、杏眼豐唇以及五官集中等特徵都和台北觀音近似。1979年雲南省文物工作隊在進行大理崇聖寺三塔的加固與維修工程，在清理該寺的千尋塔時，發現了幾十尊大理國的佛像，⑫其中有一尊觀音菩薩立像（圖11），一手持柳枝，另一手執淨瓶，頂戴寶冠，瓔珞嚴身，天衣與珠串自兩肩披掛而下，繞肘而過，垂於身軀的兩側。其瓔珞的樣式和披佩的方式都與台北和維吉尼亞的觀音像如出一轍。此外，台北和維吉尼亞的觀音菩薩所佩戴的耳璫，由一圓環與沉重的綴飾組合而成，長及兩肩。這種耳璫在遼與宋的造像裡從不曾發現，而許多大理國的真身觀音菩薩像（圖12）卻佩戴這種耳璫。凡此種種皆顯示，維吉尼亞和故宮的觀音像極可能出自大理國的藝匠之手。

雖然大阪市立美術館認為大阪觀音（圖3）是北宋初、十世紀的造像，然而此像與五代與北宋初的造像（圖5、7、8）風格有別，推斷可能也是一尊大理國的造像。其頭身比例合理，雙頰較平，四肢纖細，身軀扁瘦，與維吉尼亞和台北觀音像相較，量感明顯減弱，造像年代與維吉尼亞和台北觀音像應不相同。在千尋塔出土的文物中，有一件大理國晚期的觀音菩薩立像（圖13），其額方眼細，身形瘦長，胸部較平，造型趨於秀雅，衣紋線條流暢，宋代影響顯著，這些特徵和大阪觀音像近似，故而筆者認為，大阪觀音應是一件製作於大理國晚期，為一尊十二世紀的造像。⑬

---

⑪石鐘山石窟迄今一共發現十六個洞窟，共有造像一百三十九軀。根據現存造像題記，該石窟當開鑿於南詔天啟十一年（850）至大理國盛德四年（1179），是研究南詔、大理國造像最重要的一批材料。

⑫考古報告參見雲南省文物工作隊，〈大理崇聖寺三塔主塔的實測和清理〉，《考古學報》1981年2期，頁245-266；姜懷英、邱宣充編著，《大理崇聖寺三塔》（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頁71-80。

⑬大理國佛教造像風格的研究，參見李玉珉，〈南詔大理佛教雕刻初探〉，收入於藍吉富等著，《雲南大理佛教論文集》（高雄大樹：佛光出版社，1991），頁347-38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易長觀世音

在大理國現存的文物裡，最重要的當屬現藏於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大理國描工張勝溫所畫的〈梵像卷〉。該畫卷全長1636.5公分，繪製了數百尊佛、菩薩、明王、天王、護法等，可謂一部大理國佛教圖像的百科全書。在這一畫卷上，有一幅觀音菩薩（圖14）右手執柳枝，左手持澡瓶，端立於蓮台之上。其頭戴華冠，身披瓔珞，瓔珞披佩的方式與上述三件觀音菩薩立像雷同，更重要的是，祂腹前的圓板上也描繪著涅槃圖，而大腿處則有一尊坐佛，這些圖像特徵都與上述三尊觀音菩薩像相吻合。本幅右上角的榜題為「易長觀世音菩薩」，故維吉尼亞、台北和大阪的觀音菩薩像當稱作「易長觀世音菩薩」像無疑。由於這三尊易長觀世音菩薩像的右手手勢與〈梵像卷〉上的易長觀世音菩薩相同，故這三尊觀世音菩薩像的右手原來很可能也執持著柳枝，只是目前此一持物已佚。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唯有在大理國的文物中，才有易長觀世音作品的發現。易長觀世音這個稱號不見於經藏的記載。早在六十年前，Hellen Chapin便指出，由於大理國十七世主段政興（也作段正興，1147-1172在位）又稱段易長，故其對「易長觀世音」的名號提出了以下兩個解釋：一、受到當地天王(Devarāja)信仰的影響，中南半島的柬埔寨和占婆常將統治者的名字，加諸於神名之上。大理與中南半島毗鄰，受到東南亞文化的影響，所以將大理國主段政興的「易長」之名冠於觀世音之上。二、《圭峰宗密禪師傳》有「易短為長」之語，易長觀世音之名很可能即由這個說法演繹而出。⑭由於圭峰宗密禪師（780-841）與大理國並無任何淵源，所以以宗密禪師「易短為長」之說來解釋易長觀世音菩薩的意涵，並不適切。因此許多學者，如李霖燦⑮、松本守隆⑯和古正美⑰等都採Chapin氏的第一種說法，主張是將大理國主段易長的名號，加諸於觀音之上，表現佛王一體的觀念。可是以上的研究指出，早在十世紀時，大理國就有易長

⑭Hellen B. Chapin,“Yünnanese Images of Avalokiteśvara,”*Harvard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2 (1944), pp. 176-177.

⑮李霖燦，《南詔大理國新資料的綜合研究》，頁27。

⑯Matsumoto Moritaka,“Chang Sheng-wen's Long Roll of Buddhist Images: a Reconstruction and Iconology”(Ph.D. diss., Princeton University, 1976), p. 245.

⑰古正美，〈南詔、大理的佛教建國信仰〉，收入古正美，《從天王傳統到佛王傳統：中國中世佛教治國意識型態研究》（台北：商周出版社，2003），頁437-43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觀世音菩薩像的鑄造，比大理國主段易長的活動年代要早了一百多年，因此從東南亞天王信仰的基礎上來解釋易長觀世音菩薩的出現，有待商榷。

經查閱觀音經典，在唐不空（705-774）翻譯的《葉衣觀自在菩薩經》中，發現了一則與「易長」相關的記載，此經提到：

> 又法若國王男女難長難養，或短壽、疾病纏眠、寢食不安，……則於所居之處，用牛黃或紙或素，上書二十八大藥叉將真言，帖（貼）四壁上，……帖（貼）真言已，於二十八大藥叉將位，各各以香塗一小壇，壇上燒香、雜華、飲食、燈燭、閼伽，虔誠啟告：唯願二十八大藥叉將并諸眷屬，各住本方護持守護某甲，除災禍、不祥、疾病、夭壽，獲得色力，增長聰慧，威肅端嚴具足，易養易長，壽命長遠。作是加持已，二十八大藥叉將不敢違越諸佛，如觀自在菩薩及金剛手菩薩教敕，晝夜擁護臥安覺安獲大威德。若有國王作此法者。其王境內災疾消滅，國土安寧，人民歡樂。⑱

由此看來，依葉衣觀自在菩薩的二十八大藥叉壇法，可以使皇室中為疾病所擾者，或因病夭壽者，「易養易長」。南詔晚期以來，雲南地區觀音信仰和密教都十分流行，「易長觀世音」的命名可能就受到了這類與觀音壇法有關的密教經典的啟發。這點可以從易長觀世音圖像的特徵上，進一步得到證實。

易長觀世音一首二臂，手持淨瓶，圖像特徵與一般的顯教觀音菩薩無異。然而大阪觀音的寶冠中出現了大日如來，維吉尼亞和台北這兩尊大理國所造的易長觀世音菩薩像，祂們的寶冠中更出現了密教金剛界中的五方佛，自右而左分別為兩手作禪定印的西方阿彌陀佛，右手作觸地印的東方阿閦佛（圖1C），兩手結智拳印的大日如來（圖1D），右手作無畏印的北方不空成就如來，右手作與願印的南方寶生如來（圖1E）。目前學界對大理國的密教有不同的看法。根據寫經與文物的分析和研究，藍吉富指出，南詔、大理國時期的密教仍處在雜密階段的「法術」式信仰，並未形成龐大複雜的獨立密教體系；⑲而張錫祿則以為雲南大理的密教應屬瑜伽部，乃傳承漢地開元三大士善無畏、金剛智、不空及弟子們所弘揚的正純密教。⑳根據了維吉尼亞、台北和大阪這三尊易長

⑱〔唐〕不空譯，《葉衣觀自在菩薩經》，《大正藏》，第20冊，頁448中-449中。
⑲藍吉富，〈南詔時期佛教源流的認識與探討〉，收入《雲南大理佛教論文集》，頁167-169。
⑳張錫祿，《大理白族佛教密宗》（昆明：雲南民族出版社，1999），頁38-41。

國立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觀音像冠住金剛界五方佛的特點來看，我們至少可以肯定十至十二世紀時大理國已有純密體系的佛教的流傳。

易長觀世音的信仰源流及文化背景

七世紀中葉，蒙舍詔統一了其他五個烏蠻部落，在雲南成立了南詔國。南詔國滅亡以後，歷經大長和國、大天興國和大義寧國幾個短暫的朝代，於西元九三七年，白族人段思平又在雲南建立了大理國，維持了近三百年的政權。南詔和大理國雖然在時代上並不連續，不過二者的文化卻一脈相承，都與佛教有著密切的關係。然而上文所述的大理國易長觀世音信仰，並非大理國所創，而是從南詔文化中滋養而生的。在明清的雲南地方志書—《僰古通記淺述》㉑中，發現了一則與易長觀世音像有關的記載，頗值注意。該書云：

> 王（指南詔國王酋隆，859-877在位）伐益州（今四川成都），得一觀音，回至蓮花江，軍多船少，主化一大龍為橋，以濟渡之。又過江，水泛漲，主以劍砍水斷流，軍得渡焉。凱回至國，以所得金銀錢糧寫《金剛經》一部、（疑漏「造」字）易長觀世音像、銅鐘一二，效之而寫《金剛經》，設觀音道場，觀音化梵僧來應供。主曰：吾欲再征伐，如何？僧曰：土廣民眾，恐難控制。乃止。主以四方八表夷民臣服，皆感佛維持，於是建大寺八百，謂之藍若，小寺三千，謂之伽藍，遍於雲南境中。家知戶到，皆以敬佛為首務。㉒

目前姑且不論這則記載中神異的色彩，但它卻透露了幾個與易長觀世音有關的重要訊息。首先該文提到「王伐益州，得一觀音」，後來又言「凱回至國，以所得金銀錢糧……（造）易長觀世音像」。文中雖然沒有明確說明，酋隆在攻伐益州時所得觀音的尊號為何，可是從前後文的關係來看，這尊觀音極可能就是他凱旋歸國後所造易長觀世音像的祖本。若然，雲南地區的易長觀世音信仰

㉑雲南地區早期的信史文獻不多，涉及佛教發展狀況的資料更少。《僰古通記淺述》一書雖然成於明末清初，可是此書是依據大理國的《僰古通》演繹而成。《僰古通》是用白文將唐、宋期間雲南地區南詔、大理國的歷史傳說和故事記錄下來，只可惜此書目前已經不存，故雖然《僰古通記淺述》為明、清之作，可是部分資料仍可以補正史之不足。

㉒尤中校注，《僰古通記淺述校注》（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88），頁79。

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 期刊資料庫

和圖像與成都當有很深的淵源。

實際上，上述三尊大理國易長觀世音像身上所見的交織成網、繁縟華麗的瓔珞樣式，在邛崍石笋山㉓、彭山龍門寺㉔、夾江千佛岩㉕等地的唐代造像中時有發現，邛崍、彭山和夾江都在成都方圓一百五十公里之內，這些地方的造像當然深受成都造像的影響，足以反映成都地區的風格特徵。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夾江千佛岩第九十龕中的左脇侍菩薩像（圖15A），雖然這尊菩薩像的面部、腹部和右大腿部分殘損嚴重，可是從其現況觀之，仍知此像原來應頂戴高冠，胸佩繁縟華麗的瓔珞，腰腹之際有一圓形的飾物，其下懸一長及於地的珠串，與大理國易長觀世音的瓔珞樣式十分相似。更值注意的是，這尊菩薩像和易長觀世音像一樣，在雙膝附近也浮雕著一尊禪定坐佛（圖15B）。

唐代，成都通南詔有南北兩道，北道南經嘉州（今四川樂山）至戎州（今四川宜賓），取石門道，經靖州（今四川大關）、曲州（今雲南昭通）至拓東（今雲南昆明）。南道則經邛州（今四川邛崍）、雅州（今四川雅安）、出邛崍關，經黎州（今四川漢源縣北），渡大渡河，出清溪關，經嶲州（今四川西昌），渡瀘水，經姚州（今雲南姚安），接南詔境內的東西驛

㉓石笋山摩崖造像位於邛崍市區西北25公里的大同鄉景溝村，在該造像中發現唐大曆二年（767）的題記，從風格上來看，應是中、晚唐時期的作品。該地造像中身佩繁縟瓔珞的菩薩像參見Angela Falco Howard,"Tang Buddhist Sculpture of Sichuan: Unknown and Forgotten,"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no. 60 (1988), Plate 142；李巳生主編，《中國美術全集．雕塑編12．四川石窟雕塑》（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1988），圖85、90。

㉔圖見李巳生主編，《中國美術全集．雕塑編12．四川石窟雕塑》，圖91。

㉕千佛岩摩崖造像位於夾江縣城西2.5公里處，根據調查資料，千佛岩有唐先天元年（712）、開元二十七年（739）、開元年間（714-741）、大曆十一年（776）、會昌二年（842）、大中十一年（856）等年號的銘刻題記。學者的研究指出，夾江千佛岩摩崖造像的年代下限應在會昌年間。相關資料參見曹恒鈞，〈四川夾江千佛岩造像〉，《文物參考資料》1958年4期，頁31；王熙祥、曹德仁，〈四川夾江千佛岩摩崖造像〉，《文物》1992年2期，頁58-66；Henrik H Sorensen,"Sulptures at the Thousand Buddhas Cliff in Jiajiang, Sichuan Province," *Oriental Art*, vol. 43, no. 1 (Spring 1997), pp. 37-48. 該地造像中身佩繁縟瓔珞的菩薩像參見Angela Falco Howard,"Tang Buddhist Sculpture of Sichuan: Unknown and Forgotten," Plates 101, 102.

臺灣大學藝術期刊資料庫

道。㉖而上文所述的邛崍乃南道的重鎮，彭山是北道的必經之地，而夾江又與北道重鎮眉州（今四川眉山）有大道相連。上文已經指出，易長觀世音像與成都附近的邛崍、彭山和夾江造像的瓔珞樣式有不少相似之處，因而推測，南詔王酋隆攻伐益州時，在成都附近所得觀音像，極可能就是酋隆凱旋歸國後所造易長觀世音像的祖本。

根據《焚古通記淺述》的引文，南詔國第十一代主酋隆不但造易長觀世音像，「並設觀音道場」。雖然此文並沒有明確說明酋隆所設的觀音道場是否就是易長觀世音道場？不過從前後文的關係來看，我們也不能排除這種可能。假設酋隆所設的的確是易長觀世音道場，那麼酋隆應該是第一位在南詔推動易長觀世音信仰的人物。《新唐書》〈南蠻傳〉記載，酋隆寇蜀之事發生於咸通十年（869），㉗由此推斷，南詔國易長觀世音信仰的流傳當不會早於九世紀的七〇年代。

在南詔流傳的佛教信仰中，最具地方特色的當屬阿嵯耶觀世音。藤井有鄰館所藏的〈南詔圖傳．文字卷〉（卷末書有中興二年〔898〕的年款㉘）詳細記述了阿嵯耶觀世音在南詔七次渡化人民的故事。此卷的〈第一化〉言道：

> 又於興宗王（674-712在位）之時，先出一士，號曰各郡矣，著錦服，披虎皮，手把白旗，教以用兵。次出一士，號曰羅傍，著錦衣。此二士共佐興宗王統治國政。其羅傍遇梵僧以乞書，教即封民之書也。（下註：其二士表文武）後有天兵十二騎來助興宗王，……從此兵強國盛，闢土開疆，亦即阿嵯耶之化也。

興宗王時觀音化現為梵僧，到雲南行化，在他的協助下，南詔得以國勢強盛，獨霸西南。因此，南詔和大理國人民遂稱此梵僧為「梵僧觀世音」或「建國觀世音」，而祂的本尊則被稱作「真身觀世音」或「阿嵯耶觀世音」。易長觀世

㉖參見嚴耕望，《唐代交通圖考．第四卷．山劍滇黔區》（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86），頁1179-1284。

㉗參見《新唐書》卷二二二〈南蠻傳中〉（北京：中華書局，1974），頁6286。

㉘雖然〈南詔圖傳．文字卷〉卷末書有中興二年的款書，但從其字體觀之，當為後代的傳抄本。該卷的圖版見李霖璨，《南詔大理國新資料的綜合研究》，頁140-150。

臺灣大學圖書館 期刊資料庫

音信仰傳入南詔以後，又與這個信仰結合，因此《僰古通記淺述》稱，酋隆在設（易長）觀音道場時，「觀音化梵僧來應供」。同時，在大理崇聖寺千尋塔出土的文物裡，也發現了一尊大理國的木雕真身觀世音像（圖16），該像正面朱書「易長真身」，㉙由此可見，南詔、大理國時，易長觀世音和梵僧觀音一樣，都被視為真身觀世音菩薩的化現。

自漢迄明，雲南大理地區即採特殊的「冠姓雙名制」。㉚大理國時，取名字時大量採用佛號，如李觀音得、張般若師、㉛李楊天王秀、㉜李大日賢㉝等，當然「易長」也在考慮之列。目前除了大理國第十七世主段政興（1148-1172在位）又稱段易長外，在雲南發現的古文物與文獻裡還可以找到一些在名字中夾有「易長」佛號的例子。例如，美國聖地牙哥美術館（The Fine Arts Gallery of San Diego）收藏著一件大理國的觀音像（圖12），此像背後有一則造像記云：「皇帝（皛）信段政興資為太子段易長生、段易長興等造記。願祿筭塵沙為喻，保慶千春，孫嗣天地標機，相承萬世。」㉞文中的段易長興就是大理國第十八世主段智興（1172-1200在位），段易長生為段智興的兄弟。此外，在諫議大夫敕賜大師楊俊升撰〈大理國故高姬墓銘〉中，也載述著高姬為「天下相國高妙音護之女，母建德皇女段易長順，翰林郎李大日賢之內寢也。」㉟從「建德皇女」一詞看來，高姬的母親段易長順就是大理國主段政興的女兒。有趣的是，目前所發現夾有「易長」佛號的人物皆為大理國的皇室成員。更值得注意的是，這些人物均與大理國主段政興有關。段政興不但自己以「易長」為名，同時在子女的名字裡也都夾著「易長」這個佛號，可見段政興篤信易長觀世音。此外，段智

㉙姜懷英・邱宣充，《大理崇聖寺三塔》，頁74，圖版109。

㉚「冠姓雙名制」又稱「冠姓三字名」，有關雲南的「冠姓三字名」研究，參見楊政業，〈大理白族地區的"冠姓三字名"〉，《雲南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4年3期（1994年9月），頁50-53。

㉛〔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收錄於方國瑜主編，《雲南史料叢刊》（昆明：雲南大學出版社，1998），第二卷，頁232。

㉜大理國盛德四年（1179）敬造石寶山獅子關區的梵僧像上有楊天王秀的題名，參見張錫祿，《大理白族佛教密宗》，頁164。

㉝大理市博物館，〈大理市收集的四方大理國末期的碑刻〉，《考古》1987年9期，頁791。

㉞李霖燦，《南詔大理國新資料的綜合研究》，頁26、圖版貳-G。

㉟大理市博物館，〈大理市收集的四方大理國末期的碑刻〉，頁79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興於利貞時期（1173-1176）敕命張勝溫所繪製的〈梵像卷〉中，也發現了一尊「易長觀世音菩薩」像（圖14），推測段智興很可能也是易長觀世音的信徒。

由於目前筆者所收得的資料，無論是南詔國的酋隆或是大理國的段政興、段智興都是帝君，這似乎意味著，易長觀世音信仰的發展很可能與南詔、大理國的皇權有著密切的關係。上述三尊易長觀世音像的瓔珞中，佛三尊像的兩側都出現了四川造像所無的雙龍裝飾，恐不是單純地在表現瓔珞的繁縟華麗。南詔、大理國雖然與唐、宋分庭抗禮，但彼此交往頻繁，文化深受中土的影響，因此對龍作為皇權重要象徵的觀念當不陌生。很可能在這個認識的基礎上，當南詔國在仿製易長觀世音像時，特別融入了雙龍的圖案，作為易長觀世音與皇權緊密結合的一個註腳。

小結

綜上所述，咸通十年酋隆寇蜀時，於成都或其附近，得到易長觀世音菩薩一尊，凱旋歸國後，不但摹造此像，同時設立道場，為南詔、大理國易長觀世音信仰的肇端。自此以迄十二世紀下半葉，易長觀世音信仰在南詔、大理國的流傳歷久不衰，而其特別受到了皇室的重視。又因為維吉尼亞和故宮的易長觀世音像皆頂戴金剛界五方佛冠，大阪觀音的寶冠中也出現了大日如來，這些圖像反映南詔、大理國時期，也曾有純密的流傳。

南詔、大理國先後互據西南六百年，可是現存的南詔、大理國信史資料有限，又非常零散。元明以來撰述的地方志書或語焉不詳，或傳說神話雜陳，以至於許多雲南早期的宗教、文化、以及歷史等問題，混淆不清。南詔和大理國的考古、美術文物卻以清楚的視覺形象，忠實地記錄了當時的宗教內容、文物制度，並具體地反映了當時歷史狀況。它們不但可以與文獻的記載相印證，更可以彌補雲南早期史料的不足，南詔、大理文物的研究實為探討雲南早期歷史不可或缺的一環。然而目前所存的南詔、大理國文物並不豐富，學界對〈南詔圖傳〉與〈梵像卷〉這兩畫卷著力較多，可是對南詔、大理國佛教造像時代特徵的探討則寥寥無幾，再加上，目前有紀年的作品不多，除了石鐘山石窟第三窟的彌勒佛和阿彌陀佛龕有南詔天啟十一年（850）的紀年外，其他的紀年作品皆集中於十二世紀。在缺乏十、十一世紀斷代標準作的狀況下，南詔、大理國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造像的斷代分期研究十分棘手。究竟在世界各博物館與私人收藏中，目前認為是五代、宋的傳世作品裡，還有多少是大理國的造像，值得我們去深入發掘。這些作品正確的定位將有助我們對南詔、大理佛教文化進一步的認識。

(責任編輯：黃琪惠)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1A 易長觀世音菩薩立像（正面）　十至十一世紀　大理國　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B 易長觀世音菩薩立像（側面）　十至十一世紀　大理國　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臺灣大學藝術期刊資料庫



圖1C 易長觀世音菩薩立像（局部） 十至十一世紀 大理國 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D 易長觀世音菩薩立像（局部） 十至十一世紀 大理國 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E 易長觀世音菩薩立像（局部） 十至十一世紀 大理國 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臺灣大學圖書館 期刊資料庫



圖1F 易長觀世音菩薩立像（局部）　十至十一世紀　大理國　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G 易長觀世音菩薩立像（局部）　十至十一世紀
大理國 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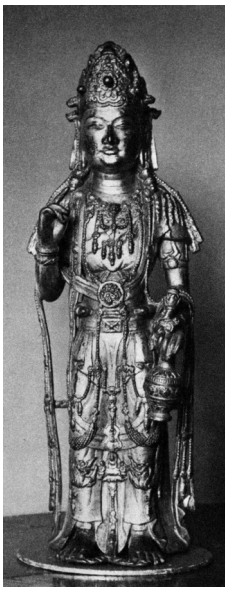


圖2A 易長觀世音菩薩立像（正面） 十世紀 大理國 美國維吉尼亞美術館藏 *Chinese Buddhist Bronzes*, Fig. 56a



圖2B 易長觀世音菩薩立像（側面） 十世紀 大理國 美國維吉尼亞美術館藏 *Chinese Buddhist Bronzes*, Fig. 56b



圖3 易長觀世音菩薩立像 十二世紀 大理國 日本大阪市立美術館藏《大阪市立美術館藏品選集》圖173



圖4 觀音菩薩立像 十世紀 五代前、後蜀 四川大足北山佛灣第二五三龕 《大足石刻雕塑全集・北山石窟卷》圖5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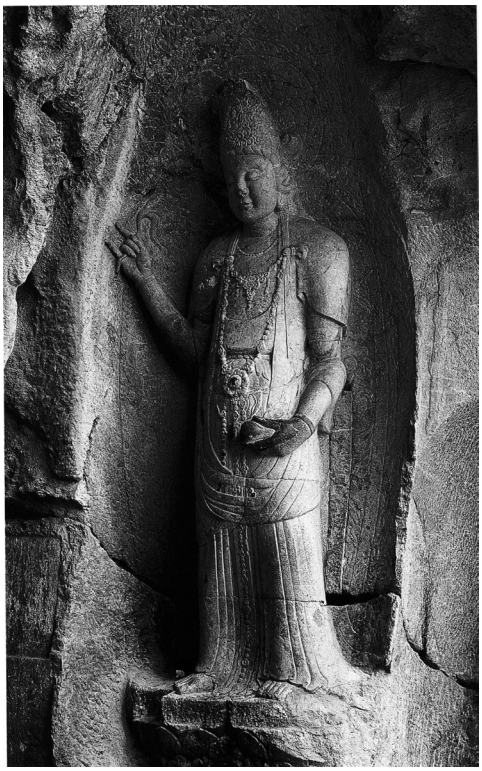


圖5　觀音菩薩立像　十世紀下半葉　北宋浙江煙霞洞窟口右側　《中國石窟雕塑全集10南方八省》圖25



圖6　菩薩立像　重熙七年（1038）遼代　山西大同下華嚴寺



圖7　觀音菩薩　永平五年（915）五代前蜀　四川大足北山佛灣第五十三龕　《大足石刻雕塑全集・北山石窟卷》圖35



圖8　釋迦佛立像　宋雍熙二年（985）日本京都清涼寺藏　《釋迦信仰と清涼寺》圖40

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
期刊資料庫



圖9 梵僧觀音三尊像 九世紀 南詔國 美國波士頓美術館藏 *Der Goldschatz der Drei Pagoden*, Abb. 47



圖10 觀音菩薩 二十世紀 大理國 劍川石鐘山石窟第七窟 作者自攝



圖11 觀音菩薩立像 十一世紀 大理國 大理崇聖寺千尋塔出土 雲南省博物館藏 作者自攝



圖12 真身觀世音菩薩立像 段政興時期（1147-1172） 大理國 美國聖地牙哥美術館藏《南詔大理國新資料的綜合研究》圖版貳

臺灣大學美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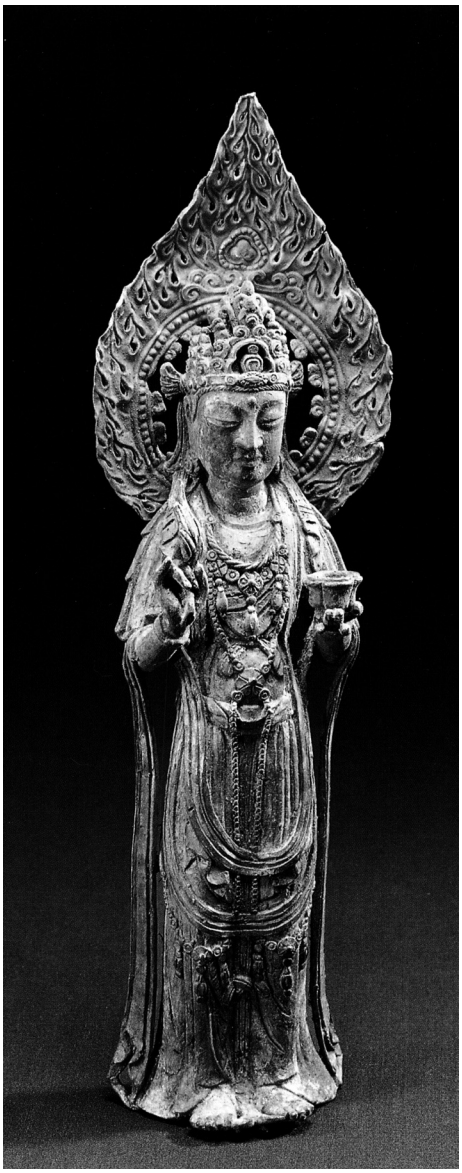


圖13　觀音菩薩立像　十二世紀　大理國　大理崇聖寺千尋塔出土雲南省博物館藏



圖14　易長觀世音菩薩　張勝溫畫〈梵像卷〉（局部）　利貞時期（1173-1176）　大理國　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南詔大理國新資料的綜合研究》頁11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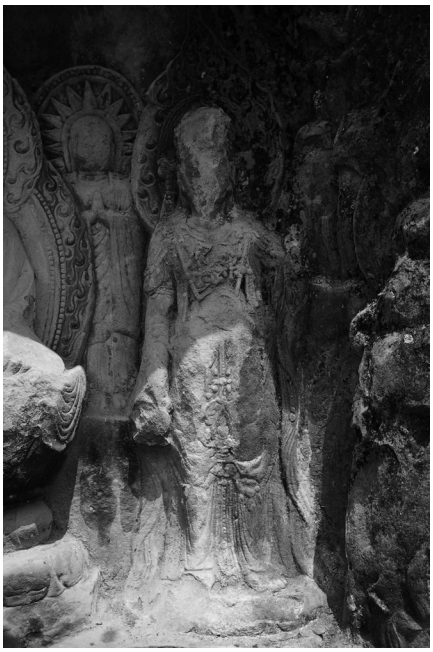


圖15A 觀音菩薩立像 唐代 四川夾江千佛岩第九十龕 作者自攝



圖15B 觀音菩薩立像（局部） 唐代 四川夾江千佛岩第九十龕 作者自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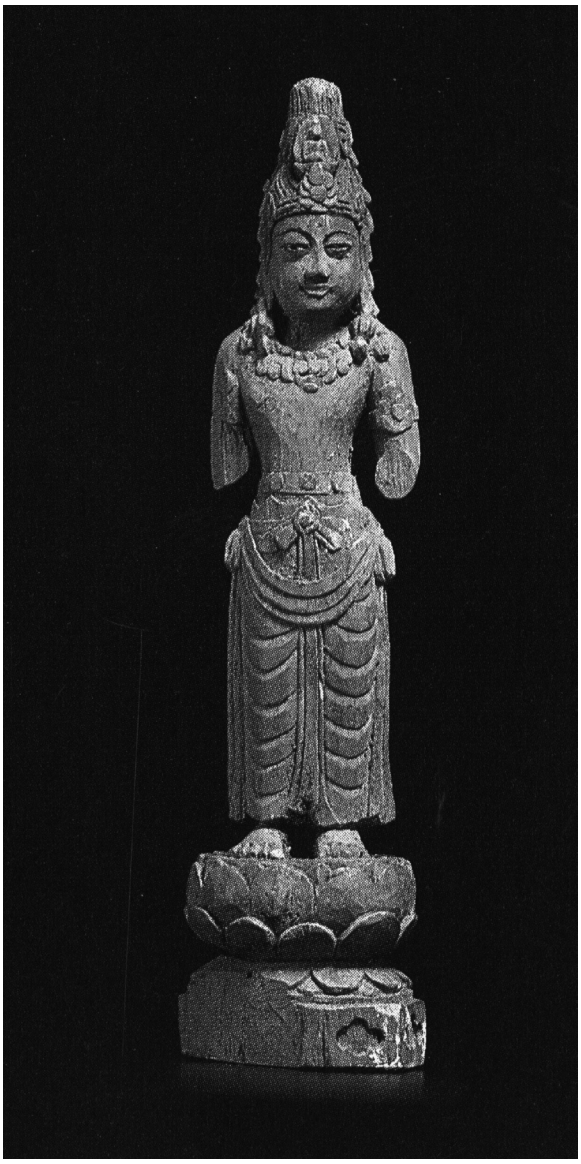


圖16 易長真身觀世音菩薩 十二世紀 大理國 大理崇聖寺千尋塔出土 雲南省博物館藏*Der Goldschatz der Drei Pagoden*, Kat. Nr. 5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易長觀世音菩薩立像（正面）　十至十一世紀大理國　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